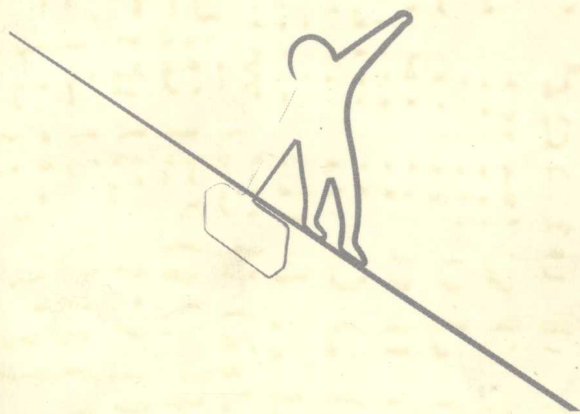


谁来关注

陈宪/著

利益失衡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F12-53

C595.1/7

8

F12-53

C595.1/7

谁来关注 利益失衡

陈宪著

由科
技
—
半千
版印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来关注利益失衡/陈宪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96-0154-9

I. 谁... II. 陈... III. 经济—中国—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6424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陈 力

责任编辑: 张瑞军 陈 力

技术编辑: 杨 玲

责任校对: 郭红生

880mm×1230mm/32

8.5 印张

205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书号: ISBN 978-7-5096-0154-9/F·15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作者小传

我从小在大学校园长大，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轨迹有较大的影响。1960年夏天，当我未满6周岁，还在上海交大幼儿园中班时，由于子弟小学一年级招两个班的计划完不成，要从中班选一部分同学去上小学。幼儿园老师和我父亲说，你的儿子可以上学了。父亲显然赞同这一建议。他对我说，这样的话，你22岁就大学毕业了。所以，在小学时，我和我的二姐是在同一个班的。尽管交大子弟小学当时校舍条件很一般，但师资水平比较高。而且，用今天的话说，它是一所很注重素质教育的学校。我记得，在六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参加过学校的乒乓球队、旗语队，还担任过少先队大队的联络员，去区少年宫为学校办事。在学习上，两门主课——语文和算术，成绩都很好。算术好的证明是，我曾经代表学校去参加和其他学校对抗的速算比赛。那时，哪位学生语文好，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老师经常在课堂读他的作文。一位语文老师曾经和我妈妈说，我们不能多读陈宪的作文了，他会骄傲。以前说一个人骄傲，是很常见的批评。无论如何，我比较喜欢写文章的习惯，和交大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和语文课有关。

1966年6月，当我小学即将毕业，要参加“中考”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根据当时的学习成绩，老师让我填了“上海中学”（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作为第一志愿。可是，就在1966年，“中考”、“高考”都“理所当然”地取消了。以后被称为“初



中 69 届”（王安忆的一篇小说以此为题。她也是其中的一员）的我们，没有按时进入中学，小学毕业后的一年多时间，是流落于社会的。更为可怕的是，当时“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都受父母的连累，被少数“红五类”的子女欺负。对我来说，那一段时光是黑暗的。到 1967 年 9~10 月间，根据毛主席“要复课闹革命”、“要进一步复课闹革命”的指示精神，我们按照就近原则进了中学。在那所初级中学，我们没有认真读过一天书。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学工”（到工厂劳动）、“学农”（到农村劳动）和“学军”（参加军训）占了一半左右的时间。我们一共发过三本教科书，除了《代数》是“文革”前的教科书，物理课、化学课都分别发了名为《工业生产基础知识》和《农业生产基础知识》的教科书。我还记得，这三本书都没有上完，我们就毕业了。

1970 年 4 月，尚未年满 16 周岁的我，就去插队务农了。我所在的江西农村，是一个产粮区，人多地少，每个劳动力平均 10 亩地左右。而且，实际数字是大于统计数字的，因为在当时，为了尽可能少交农业税，多留口粮，耕地是被瞒报的。现在每到炎热的夏天，我就会回想起当时的“双抢”。就在最热的 7~8 月间，为了趁凌晨凉快，我们每天两三点钟就被所在小组的农民叫起，揉着惺忪的双眼，高一脚低一脚走到田头，开始“早上一片黄、晚上一片绿”的抢收、抢种。我是祖传的特别能出汗，每当到了中午时分，我就浑身没有一丝干纱，老俵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出汗的人。我和我的同学们相比，算是运气好的，只参加了三个“双抢”，就离开了曾经思考过未来、憧憬过理想的“广阔天地”。

1972 年末，我被“上调”到南昌铁路局公安处工作。这真有如鬼使神差。那时的“上调”是要根据现实表现的，尽管我的表现也不错，但还有比我更好的。我的一位同学（直到今天，我和



他的父母都还住在同一栋交大的宿舍里)当时已是生产大队的团总支副书记了。名额首先给了他。不幸的是,大队在推荐时,只注重了现实表现,而忽视了“家庭出身”。据说,他未被审查通过的原因,是有一位姑母在台湾。在那个年代,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来招工的两位公安干部对大队的推荐有意见,提出要看所有男知青的档案。不知他们怎么看中了我的档案,提出要见我,但因为1972年春节我在生产队留守,招工的我人在上海。所以,公社“五七大军”连部就一纸电报把我从上海叫回来。很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就在生产队等他们来带我。然而,就在我天天盼望的时候,十分郁闷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去赶县里一年一度的大集。一路上,我在悄悄注意南昌方向开过来的长途汽车,真想看到他们就在车上。那时南昌到靖安一天就两三班车。巧的是,我看到一班车上有两个穿着警服的人。到了县城,我就去了县招待所,果然,他们到了。可他们给我带来的消息,却是因为我的档案上有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问题,所以,靖安县招的另九位铁路警察被他们带走了,但我不能被带走。回去的路上,我一言不发,同学们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不过,他们没有丢下我,经过派人到上海调查,大约三周后,我被他们带走了。

在铁路公安工作的六年多,前三年我在派出所,驻过小站,执过勤;后三年在公安处机关,先是在政治处“打杂”,半年后被任命为公安处团委副书记。从派出所调到机关工作的原因之一,是我发挥了小学期间获得的语文的“比较优势”,在南昌铁路局的机关报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干”,被公安处组织科的同志发现,他们和南昌分处商量,把我调到了处机关。这对当时在所队一线的干警来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顺便说一句,我那时到南昌局铁路沿线的派出所出差,那些团员青年干警,是会给我敬礼的。但是,在公安处机关,我领略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和权



力斗争。这是我大学毕业不愿再去机关工作的重要原因。

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的工作已经比较稳定，并如上述，有了一官半职。但从小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上大学，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心结”。即使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那几年，我也试图争取过，但公安处没有名额，我的努力是徒劳的。和其他怀有大学梦的青年人一样，一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走进大学门。至于铁路的“铁饭碗”，团委书记的位子，都是可以放弃的。尔后，我开始了补习（不是复习，我没有“习”可“复”）应考。可是，我的基础实在太差，而且，铁路公安的工作使我根本无法正常地参加补习班。根据我当时的情况，只有考文科，因此，尽管物理、化学可以不考（我经常说，我们这一代人，即使上了大学，知识结构也是有问题的），但数学是必考。1977年的高考是各省市出卷，我在江西的数学卷上只得了3分。江西当年的规定，考文科的数学不计入总分，可我因为总分差7分，而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进而与“77届”这个光荣称号永远地失之交臂。1978年，问题还是出在数学上，未果。在我入学的1979年，数学考了44分（4对于我来说，是吉祥数字。现在我家的电话号码有4个4。我非常认同的说法是，每个人的吉祥数字是不同的）。这个分数即使在我被录取的计统系，也是不低的。就这样跌跌撞撞，我总算走进了大学校门。

对于我个人来说，恢复高考的重要性还不止这些。因为参加高考，我认识了我的岳父母，然后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的同事丰国俊在大学毕业到厂矿劳动锻炼时，和我岳父家在一起。他是当时公安处为数不多的积极支持我参加高考的几位同事之一。当他得知我总分差了7分时，就带着我去了我以后的岳父家，了解是否有降分的可能性。我岳父时任江西省招办副主任。尽管事情不可能有任何转机，但我却修得另一枚“正果”。



我不知有没有记错，1979年江西的高考志愿是按省内和省外填的。省外的第一志愿我填了在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省内的第一志愿是江西财经学院（现为江西财经大学）。由于我的考分不高，未被华政录取。在“文革”期间，中国大陆的财经院校除了东北财经学院（现为东北财经大学）保留了，湖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降格为湖北财经专科学校外，其余全部取消了。因此，我们入学时，江西财经学院正在南昌郊区一个叫下罗的地方恢复建校。我去学校报到时，学校就像一个建筑工地。我清楚地记得，就在我报到的当天下午，学生宿舍的施工现场发生事故，死了两名民工。也是因为刚刚复校的原因，学校的师资状况是不尽如人意的。最初，我是“以貌取人”的，我那时似乎只看到一位带着玳瑁架眼镜的英语老师，和我儿时在交大看到的教授比较像。

在大学的四年，我基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是，由于我以往的工作经历，因此，在入学报到前，我就被指定为班团支部书记。两年后，又担任了班长。我是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处理班务的，好在其他班干部是十分配合的。不过，由于我用心太少，对当时班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不知晓，这是在毕业后的几次同学聚会时，大家谈起诸如某某男生追求某某女生的故事，我才发现的，对这些事我大多“蒙在鼓里”。时间是有机会成本的，在其他地方用得少了，在学习上就用得多了，所以，在大学期间，我还是读了不少书。到毕业前，自然地想报考研究生。上海人的一个“毛病”：总想回上海。我毕业时考研的选择，是上海财经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这个专业当年有6个招生名额，可初试的结果是没有一位考生上了复试分数线（5门课考试，总分300分为复试线）。校方将复试线降到290分，复试了3位考生，其中，江财2位，上财1位。上财



派老师到江财复试时，我正在景德镇市计委实习，接到通知匆忙赶回来，参加了以笔试方式进行的复试。但最终降分未被批准，我没有能够如愿。毕业分配时，我没有任何犹豫，放弃了当时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首选的从政道路，自己要求到高校工作。这里，除了上述不愿去机关工作的原因，想继续考研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江西大学（现为南昌大学）与我妻子工作的江西省环境保护研究所只有 200 米之遥，我去了那里。

我还要用一些篇幅，说一下我在江财念书的这个班和班上的同学们。在恢复高考后的 3~4 届学生中，年龄差距大、生活背景各异是显著的特征。在 77 届、78 届，同班同学年龄相差 20 岁的大有人在。记得到 79 届报名时，规定考生年龄一般不超过 25 岁，特殊情况可放宽到 28 岁。我当时就踩在不超过 25 岁的线上报考的。在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 28 岁，最小的 15 岁。年龄小的同学一般在班上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大多精力集中，认真学习。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由于都有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平日里难免磕磕碰碰。要说起来，当时我们班在这方面也挺复杂。因为我处事方式简单、公正（有毕业留言册上的记载为证），且以身作则，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读书上，因此，我们班的班风是健康的。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班 53 位同学中，现职厅局级以上官员 20 位左右，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5~6 位，其中，有以下代表人物：原江西省副省长、现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中国著名证券金融学家吴晓求；中国教学名师、江西财经大学首席教授胡援成；国务院总值班室主任陆俊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张友南；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主任赖小民；北京农业商业银行行长金维虹；江西省新余市市长王平。我以做过这个班的班长、团支部书记而沾沾自喜。

到江西大学后的第一年，我又报考了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专



业研究生，但仍然没有成功。到了1985年，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计统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研究生，一举中的。在江西大学工作的这两年，做辅导员，带了经济学系三年级有80多位同学的那个班。我带班的方式和当班长的方式差不多——少管事，甚至不管事，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并极力倡导“以学为主”。根据我的观察，在那个年代，辅导员的风格对他所带班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我们经济学系4个年级4个班，风格各异，在某种程度上就像这4个辅导员。到这个班毕业时，我去人大读研了。班上有几位同学也考取了研究生，其中，一位中国社科院农经所、一位北大经济系。他们到了北京后，经常和我来往。

1985年9月，我离开南昌去北京。此时，我女儿未满周岁。由于深知机会难得，我努力完成学业，并开始了研究工作。今天回过头来看，我的性格及处事方式是比较适合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著名学者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写道，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最高表扬，就是你不像上海人。由于我从形到神，都不太像上海人，因此，我两度在北京念书时，经常受此最高表扬。我报考的专业当年招的是研究生班，1987年我毕业时，我试图回上海工作，但困难重重。拖了近半年，没有办成，我又回到江西大学。一年后，我到人大参加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主要因为硕士研究生在那时已是较高学历，1988年暑假前，在调整经济学系领导班子时，我和另一位早几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一起被任命为经济学系副主任。在这个任上的三年，前半段做得是比较愉快的，后半段，因为种种原因，就不尽如人意了。天遂人愿。就在这不如意的时候，我在一次会议期间，遇到中国人民大学钟契夫教授，他问起我是否有意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紧紧抓住了这一“贵人相助”的机会。尽管在要求学校同意报考和准备应试期间，遇到了一些麻烦和困难，但总体说来，这次考试比起前两次顺利



多了。与此同时，我开始办理调离江西的手续。1991年9月，我到人大“二进宫”。1991年12月，我们举家迁往上海。

在人大修完博士研究生的所有课程后，1992年9月，我开始在原上海大学商学院贸易经济系上课。在上海工作的头两年，我比较清闲，既没有担任行政职务，又很少有社会活动的邀请。在这一段时间，我完成了在人大期间已经开始的《经济学方法论通览》的主编工作，并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工作，1994年6月如期答辩后，又将它修改出版。1993年末，原上海大学商学院与国际商业学院合并为国际商学院，大约就在这期间，我被任命为贸易经济系主任。在1994年5月27日上海解放45周年的纪念日，原上海大学和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了新的上海大学。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调任国际经济系主任。1995年8月，我被任命为上海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并兼任着国际经济系主任。1999年9月，上海大学新校区一期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由此引发了系科、学院的调整。我所在的学院和原上海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文学院的行政管理系、文献信息管理系合并，组建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并搬迁到原上海科技大学所在的嘉定校区。合并后的前两年，我是副院长，稍后又兼任党委副书记。在官场有一句顺口溜：“吃饭要吃素的，穿衣要穿布的，当官要当副的。”这一方面说明，副职比较好当，不需要负太大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无奈的表现。2001年8月，我开始主持这个学院的工作。此后，直到现在，是我人生最有成就，也最辛苦的几年。不过，在这本书出版时，我的这一阶段要画句号了。

2001年9月，在学校领导到我们学院召集新班子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说，我们学院现在缺两样东西，一是MBA，没有MBA的商学院，不是真正的商学院；二是博士点，没有博士点，学院



的学术地位不可能得到提升。可是，当我在 2001 年 9 月说这个话时，我有底气吗？根本没有。因为当时学院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不到两位数；在读博士学位的教师，也不到两位数。办大学，不就是要要有高素质的师资吗？我很相信“苍天不负有心人”这句话。就在 2003 年末，上海大学获准试办 MBA；就在 2005 年末，上海大学获得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到 2007 年暑假前，在我们学院约 180 位教师中，有 1/3 强是 2001 年 9 月以后调来或博士毕业、博士后出站来上海大学工作的。在这 180 位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已近一半。

中国是个官本位传统影响很深的社会，大学、研究机构也不能幸免其影响，行政职务与学术水平总有某种说不清、理还乱的互动。如果校长、院长、所长或系主任把握了一个好的研究方向，通常比较容易整合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出成果，并能够持续地做下去。就在我到国际经济系工作不久，我开始组织校内外的几位老师，编写《国际服务贸易》教科书，并由此开始了我和我的团队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工作。此后，我们又从服务贸易领域，进入到服务经济这个更大的领域。2005 年开始，我们每年编撰《中国服务经济报告》，现已出版 2005 年版、2006 年版、2007 年版三本；2006 年，由我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服务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获准立项。这些标志性的成果和项目，决定了我们这个团队在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地位。

人的业余爱好在没有条件时，好像就不存在了，但一旦有了条件，就会在不经意间冒出来。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就开始给一些报刊写随笔和评论。而且，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媒体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也就一发不可收拾。近几年出版的 4 本集子，就是将已经发表的随笔、评论和演讲汇编起来的。其实，



写这些评论和随笔，不仅使我更加关注时事，这正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需要的，而且，对我的教学、科研本身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要写好这些文章，需要大量的阅读，并不断地把握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精髓。人的脑力和体力一样，是不可储存的。就像每天坚持锻炼一样，每天坚持关心时事，思考问题，笔耕不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写这篇小传期间，正是我准备卸任，不再做院长，并办理调往上海交大工作的时候。到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工作，就是回到了我开始接受教育的地方（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即将搬入徐汇校区，它是交大原来的主校区。我小时候就在这里看电影、游泳和玩耍），这难道不是一件使人感到圆满、惬意的事情吗？

陈 宪

写于2007年9月间

目 录

热点评论

公平的教育能产生更大的效益	3
燃油加价要和市场商量	7
7 万元的头等舱与廉价航空	11
老百姓需要廉价的公共服务	15
在源头遏制垄断行业高薪酬	19
谁来关注利益失衡	25
合作建房、团体购房的标本意义	29
“高考状元县”折射出什么	32
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36
外资无限制收购中国企业会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吗	39
政府产出什么、怎样产出	44
新消费税将增强调节功能	47
“北方经济中心”崛起说明了什么	51
政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55
粮价上涨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	58
上海要寻求突破	62
有些公平是绝对的	65
需求方补贴是民生资金的更好选择	69
中国的高速公路何时成为公共物品	73



服务业的细节有忧	77
愿发展惠及全体民众	80
教育如何实现真正的公平	84
银行长龙中的服务业问题	88
政府活动应力戒奢华铺张	91
现代服务业“短腿”，短在哪里	94
CPI 对民生有哪些影响	98
从指标变化看上海增长方式转变	101
“刘易斯拐点”是改善劳资关系的契机吗	105
高校为啥不能炒股	110
商业贿赂，何以标本兼治	114
建设文化大都市的经济学视角	118

茶座叙事

我在欧洲坐廉价航空	125
“三张黄牌”与企业家精神	130
“黄金甲”、数学模型及其他	135
有些不公平要逐步取消	139
护士“缺口”的两点分析	144
中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的故事	149
服务资源配置的时空难题	154
经济学的简单与复杂	160

商道陈说

商道之本是信用	165
商道领袖的社会角色与责任	168
商道的职业精神	172



品牌是企业信用的显示器	176
信用源于自由的市场	180
政府对商道信用能够做些什么?	184
治理结构要为提升企业信用服务	188
管理职能中的企业信用建设	191
服务信用之小考	195
中国的消费者及其信用	198
信息化时代的商道信用	202
承诺、约定与信用	206

演讲实录

公共政策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213
市场与组织关系中的民间组织	
——在“民间组织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的演讲	
.....	223
思想的经济学与科学的经济学	
——在上海大学的演讲 (节录)	235
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245

后 记	255
-----------	-----

热点评论

多年来，我养成了写热点问题评论的习惯。像《文汇报》的《文汇时评》、《解放日报》的《观点》和《解放论坛》、《新民周刊》的《言论》、《沪港经济》的《观察与思考》等栏目，以及《社会观察》、《探索与争鸣》等报刊，都是我经常发表热点评论的地方。我觉得，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以各种方式关注公共问题。写热点评论，就是我关注公共问题的方式。